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Youth” Discourses in Post-war Taiwan

張宗坤*

Zackary Zong-Kun CHANG

一

2019年上半年，臺灣終於擺脫「亞洲四小龍」長年墊底的醜態，經濟成長率與新加坡、日本與南韓相比居冠。「勇奪四小龍第一名」的政績，也成了蔡英文政府成功擺脫對中國大陸經貿依賴的宣傳詞。¹然而，任憑經濟成長率如何高升，「崩世代」與「厭世代」的「低薪」仍是社會熱議的話題。「世代」在此作為人們辨認時代問題——「低薪」——的關鍵：連續數年發生的實質薪資倒退，²世代之間收入、名聲與財富的不平衡感，使得「青年低薪」幾乎變成日常生活中固定連用的詞彙：低薪是當代青年專屬的、最沈重的負擔，面對臺灣茫茫未來的青年無不背負著低薪的十字架。

事實上，世代不只是低薪問題的解釋，舉凡就業市場、消費商機或政治傾向的討論，世代也是社會大眾辨認這些問題的重要媒介。隨著八年級

投稿日期：2020年1月14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6月15日。

* 張宗坤，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生、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執行秘書。
電子信箱：senran13@gmail.com。

- 1 見溫貴香。2019/08/01。〈總統：臺灣第2季經濟成長勇奪亞洲4小龍之冠〉，〈中央社〉。Retrieved from: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010051.aspx> on Aug 2, 2019.
- 2 根據國發會研究，2017年20-24歲勞工的經常性薪資平均為1999年的九成一。見黃立偉、張國樑。2019/04/10。〈國發會調查：青年薪資僅20年前的91%〉，〈公視新聞網〉。Retrieved from: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28441> on Aug 5, 2019.

生初入職場，³不少商管雜誌和企業人士紛紛開始比較他們在職場中與六年級、七年級生之間的差別。⁴企業之所以討論八年級生的問題，考慮的是如何考慮的是如何化解職場中的『世代矛盾』、管理規訓這些人成為企業需要的『勞動力』。強調他們在情感與態度上異於其他年級。也有不少文章討論到八年級生的新興創業熱潮，或是試圖解釋八年級生的消費風格。這類文章多半著重介紹成功個案的創業經驗，並強調八年級生具有的「想像力」、「創造力」、「未來性」以開啓市場不同的可能，這些智識能力終歸為創業和商機服務。青年的就業問題也一直是臺灣政壇的焦點：從蔡英文2016年大選的「青年好政」青年政策白皮書、2018年年中行政院提出的「我國薪資現況、低薪研究及其對策」，到2019年年初國民黨或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黨內初選政見會，青年低薪也都被列為重要的討論議題。2014年「太陽花學運」以降，不少新興或既有的政治團體也特別強調參政的青年是政治上的新世代，建構基於世代的「新政治對舊政治」對立，並強調新一代的他們將會為臺灣的兩黨政治格局帶來嶄新的風氣。2020大選時的「韓粉」論述，強調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的支持者多半是40歲以上的中高齡人，標記這個年齡群體在同性婚姻、兩岸問題或經濟發展態度上的同質性，成功地確立青年與中年間的敵對關係，讓藍綠之爭轉化為世代之爭，為民進黨取得二度完全執政的門票。強調世代落差、當代生活慘況的說法也吸引到不少人的共鳴與應和：每年勞動部、主計總處或者就業服務網站發布的各類調查或統計報告，不斷呈現與強化青年薪資倒退、加班時數拉長、社會保險縮水的現實，新聞媒體針對青年創業與社會貧窮現

3 指民國80-89年，即是西元1991-2000年出生的人口。其他「年級」如七年級、六年級、五年級則以此類推，係指民國70-79、60-69、50-59年出生的人口。1991年出生的人大約在2013-2014年間自大學畢業、開始尋覓第一份工作，到了這篇文章寫作的當下（2019年），1995-1996年左右出生的八年級生也開始踏入職場了。

4 以下的例子可供參考：徐珍翔。2018/11/01。〈怎麼看八年級職場新鮮人抗壓性？最多老闆說水蜜桃、第二多選檸檬……〉，《信傳媒》。Retrieved from: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2555> on Aug 5, 2019；盧智芳。2013/06/01。〈總編輯的話：轉一下，8就變成∞〉。《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第153期。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9487> on Aug 3, 2019；〈作者不詳〉。2019/07/19。〈八年級生求職態度超差？要求「30K以上拒加班」眾人戰翻〉，《今日新聞》。Retrieved from: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719/3510528/> on Aug 5, 2019。

象的奇觀式報導、中年文化名人的自我懺悔也強化了上述的事實。⁵

總而言之，「世代」顯然成了當前指認、分析與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關鍵。時代的問題被解釋為不同世代之間的矛盾與落差、個別世代內在本質的缺陷或不足。然而，世代與時代間的關係又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呢？我們為什麼這麼強調世代能夠有效解釋與解決社會的諸多問題？也似乎很少有人質疑：為什麼在各項人口統計中，可以用十年作為世代的劃分？這十年內出身、個性與經歷可能天差地別的人們，又為何可以被統一簡化為單一特徵的世代？世代之所以成為問題，雖然不能歸諸於單一原因，但也有人注意到了不同世代在不同生命過程中，因經濟與就業環境的不同，使得世代的習慣、態度、風格和價值觀，乃至於政治位置產生歧異。⁶這樣的討論固然存在經濟決定論的嫌疑，但也開啓了另一種考慮世代的途徑：透過結合臺灣的經濟發展軌跡與個人在經濟發展之下不同生命階段的感受，世代或許能夠藉此從浮面的差別，深化為具有理論與歷史意涵的分析。

當前臺灣世代問題所根植的土壤，是一個極端重視「感受」的政治環境。例如臺灣最常出現的政治口號之一「有感經濟」，意思是要讓人民對經濟成長有所「感受」。感受不只是對於政府施政的滿意度，更多時候是指生活品質的變化，例如工作重不重？今年有沒有加薪或年終獎金？油價貴不貴？門前的馬路平不平？便當一個要多少錢？衛生紙、口罩還買不買得到？細微的生活細節，構成了人們基本的生活感覺與經濟感覺，型塑了人們的政治偏好。「感受的政治」強調個人生活品質的累積與進步，這些純粹個人的體驗幾乎成了覺察社會存在的唯一礎石；至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連結、以群體的一員生活在社會上，作為集體與個體之間中介的社會感

5 例如劉克襄〈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一文，便引發四、五、六、七、八各年級的爭相共鳴。見劉克襄。2015/03/12。〈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蘋果日報》。Retrieved from: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150312/36432517/> on Aug 3, 2019.

6 例如許建榮從就業與經濟數據解釋為何六年級在政治場域中噤聲，見許建榮。2018/04/29。〈Taiwan In Numbers：時不我予的「六年級」世代〉，《上報》。Retrieved from: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9535 on Aug 5, 2019.

則付之闕如。⁷關於「感受」的政治，也強化了世代在直觀上對於社會問題的解釋力。

感受的政治之所以與世代有關，源於每個世代在不同生活階段的不同經濟條件、處在戰後台灣與戰後資本主義不同的發展階段，及因此所產生對社會的不同感受性。臺灣在戰後歷經「奇蹟」到「鬼島」的大起大落，每個年齡不同的人，在不同年齡段的生命經驗都貼合在這同一段歷史之上，也因此發生不同的變化和轉折。⁸在感受至上的情感結構中，情感特質與情感差異成了世代問題的關注重點。企業主管不斷提及青年在職場裡抗壓性低、偏好酸言酸語、難以溝通、想法淺薄；⁹在音樂、文學等流行文化中，青年自我定位在厭世、艱困、焦慮與失敗主義的情感位置……¹⁰不同世代基於不同經濟社會政治環境所產生的不同情感特質，造成了世代之間的落差感與互不理解。若不試著追蹤這些特質，並進一步指認我們賴以解讀不同世代情感特質的感覺結構，世代將淺薄化為僅具人口統計意義、斷限意涵不明的同齡群體，徹底失去可能的分析意涵。

爲了跳脫世代之爭的妒恨鏈鎖，重新體悟與同理世代間彼此的差異，重建「世代」論述的來龍去脈是本文的核心目的。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解釋「世代解釋」本身（特別是青年與其他世代之間的矛盾），並解構

7 趙剛（2014）曾對「小確幸」論述及推崇小確幸的現象進行診斷，他認為小確幸是「資本主義發展沉滯期所產生的一種高度政治性的特定文化想像」，其知識後果則是「防止社會苦難向經驗、理論，與社會探索開放。」在「感受的政治」語境之中，連結國家總體數據、政府施政表現，以及日常生活經驗之間的中介被隱藏了起來。在此，人們重視的是自身個別生活所生發的感受，這種感受與社會脈絡之間的關係卻很少被討論，或往往陷入藍綠兩黨惡鬥的敘事框架之中。也因此，小確幸可說是「感受的政治」具體而微的表現。

8 例如張晉芬（Chang 2017）運用臺灣社會基本變遷調查的資料，發現在不同的職業、教育、性別、企業規模和僱傭條件的條件下，面對2008年金融海嘯時，所需的所得獲取時間將大不相同，其後果則是所得不平等的持續擴張。

9 這也反射出企業主管養成自身情感特質的歷史過程：咬牙苦撐的封建職場環境、對問題傾向沈默、想法深但窄且執著等。但問題是：至今仍倖存在職場上的高階主管們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年代？是在經歷過什麼樣的經濟條件（多高的薪水、多快的加薪、多好的勞動條件、多封建的職場文化）以後，這種性格才能成立？

10 此點可參考同場論壇如王智明、張智琦等人的討論。

當前世代論述與世代再現的遮蔽性；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重新建構世代論述與時代狀況之間的關聯。¹¹本文借用馬克思主義成人教育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關鍵詞」（keywords）概念，依序探討三組在不同時代出現、涉及世代的詞彙，分別是：「少年／青年」、「草莓族／新新人類」，以及「崩世代／厭世代／悶世代」。威廉斯（Williams 2015: xxvii）認為，關鍵詞對特定的活動及其詮釋相當重要，並具有約束力；對某些特定的思想形式而言，亦是如此。這三組詞彙在其誕生的當下，都指涉相同的年齡層（20-30歲左右的青年群體）、也代表著社會如何認識與理解青年，但卻因為外在脈絡的不同，這些詞彙所蘊含的期許和情感並不相同。關鍵詞雖不能徹底反映出文化與歷史的變化，但卻內涵了文化與歷史的重要變化（ibid.: xxxiii）；而對本文來說，從今日回看這些涉及青年世代的關鍵詞，目的在於梳理世代如何成了社會問題的詮釋，在世代成為問題以前又歷經了怎麼樣的概念流變，並且重新思考青年群體面對的現實處境的變化。

二

在中文世界，青年群體擔綱國家希望與重任的意象，只是上個世紀的發明。在《儒林外史》、《紅樓夢》等清代章回小說中，「青年」都只是指涉年少的紈袴子弟，或二、三十歲左右的男女，這個用法最初和「少年」、「青春」混同。戊戌變法失敗後，日本和西方列強動輒以老、弱、病等負面的、身體的形容詞描述中國，梁啟超（1900）因而提出〈少年中國說〉，試圖以「少年中國」來激發中國少年的愛國情懷，對抗日本批評中國為「老大帝國」的說法。接受了現代化為中國必然命運的前提，梁啟超寄擺脫封建風氣的希望於中國少年，以中國的國體與少年的身體互喻，但卻也複製了西方的帝國慾望。在一連串老少對比之中，作為年齡群體的

11 呼應陳崇真（2019）延續對貧窮再現的批判，他認為當前的青年貧窮再現其實掩飾了「階級之間的複製與流動侷限」。

「中國少年」與國家願景的「少年中國」才逐漸合而為一。¹²

當時形成的年齡論述不只有「少年」一種，也包含「青年」。¹³1895年，美籍傳教士來會理（D. Willard Lyon）在基督教青年會北美協會的指示下來華，正式代表基督教青年協會於天津開辦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並向北洋大學的學生推廣籃球運動。1917年，由各地基督教青年會所組成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開辦《青年進步》雜誌，在其發刊詞中提到，要透過培養青年人的「品德、知識、身體和協作精神」等四種美德，才能使青年進步，並對「家庭、社會和國家有所作為」。基督教青年會賦予了青年與傳統的「青年」不同的現代寓意，是指相對於封建、愚笨、粗俗等諸種舊惡，具有強健體魄、堅定精神的現代青年（李宜涯2011），推廣運動、發行刊物是其打造現代青年的手段。1915年，陳獨秀（1915）創辦《新青年》雜誌，¹⁴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一文中，將青年譬喻為社會的「新鮮活潑細胞」，其任務在於執行「新陳代謝」來促進社會的「健康」，「以自覺而奮鬥〔…〕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在陳獨秀心中，青年所背負的時代使命，必須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這些精神正是1919年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先聲。〈敬告青年〉一文試圖召喚的對

12 關於〈少年中國說〉更細緻的分析，包含其中的老少對比、帝國慾望等問題，尤其重要的是該文在時間軸上的跳躍不定，請見劉人鵬（2000）、梅家玲（2001）。

13 除了少年、青年外，孩童也是當時出現的年齡建構之一。關於少年、青年與孩童論述之間的關係，請參考梅家玲（2006）。

14 《新青年》雜誌原名《青年雜誌》，是在1916年出版第二卷第一號後才更名的。按照陳獨秀友人、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的說法，是因為負責出版《青年雜誌》的群益書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來函，認為該刊刊名與基督教青年會的《青年》雜誌、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上海青年》雜誌過於相似，要求予以更名。見趙曉陽。2012/06/08。〈《青年雜誌》為甚麼改名《新青年》〉，《中國社會科學報》314。Retrieved from: http://sscp.cssn.cn/xkpd/hh/201206/t20120608_1121660.html on Aug 5, 2019.

陳獨秀是否主動挑選了一個與基督教青年會刊物相似的名稱？有說法認為因北洋政府的報律壓制談論社會進步言論的報刊，卻獨厚基督宗教，選擇與基督教青年會刊物類似的名稱形同是種保護色；又或者可能來自陳獨秀對基督教精神的崇拜（王燁、李永奇2009）。

象，是在大學校園裡接受西式教育與新思想、承擔社會改革責任的大學學生。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擴大展開，更讓「青年」和「學生」在政治舞台上取代少年，成為文化啓蒙與社會改革的領頭羊（梅家玲2006）。在民國初年的西方傳教士與五四人士眼中，少年與青年的身體和智能，就是促進病中的、作為大身體的「國體」新陳代謝、返老還童的細胞。

在五四運動以後，原先閉鎖於校園內的學運，漸漸擴散為在校外廣泛介入政治的學潮。近代史學者呂芳上（1994）指出，從五四到北伐，學生運動漸漸政治化並向校外擴散，與民族主義的反軍閥、反帝國主義運動匯流，再慢慢轉變為政黨吸收學生的政黨之爭，因此是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的轉變過程。青年／學生之所以積極入黨，是因為學生運動轉為政治運動之後，學生需要尋找可供依附與歸屬的思想和資源，此時的青年黨、國民黨與共產黨，均將學生看做可以積極發展與組織的人才，紛紛召開以學生為主的黨員大會和組織學生黨團、黨部或青年團。¹⁵然而，從五四運動到北伐，國民黨為治理國家的政治需要，吸收軍閥與北洋政府官僚入黨，使得黨內也習染官僚風氣，再加上以武力清除黨內的進步與左派份子，使得國民黨漸漸失去對知識份子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因為對學生缺乏策略、方法、綱領和堅實的組織運動，後來也沒有把握「抗日救國」組織青年的時機，國民黨在青年組織方面顯然落後於共產黨。

儘管在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國共雙方展開第二次國共合作，但在對青年的爭取上，雙方卻仍是競爭對手。1937年，中共將原先專責培訓工農紅軍的紅軍大學改組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連同延安的陝北工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幹部學校，開始對外擴大招收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在1941年國民黨截斷西安至延安的交通以前，知青赴延安近萬人（王鋒

15 1920年8月開始，上海、北京、天津、長沙、武昌、廣州等地紛紛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SY），1925年社會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代會後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CY）；1924年6月，國民黨於上海召開國民黨上海學生黨員大會，並設立「平民教育委員會」以推廣三民主義。1923年，少年中國學會分裂為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兩派，前者於巴黎設立青年黨，再於1925年設立「國家主義青年團」，與國共兩黨爭奪學權；後者則加入共產黨。關於上述三黨青年組織更詳細完整的整理，請見呂芳上（1994：247-418）。

2009)。另一方面，國民黨則透過招訓青年、貸金及公費制度輔助青年就學就業，並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為反制。這些制度雖對掌握青年有一定成效，但隨著戰事膠著、大後方經濟困窘、軍人與官僚的貪污腐敗，招訓、貸金與公費制度紛紛無以為繼。三青團也因缺乏經費人力與資源、淪為黨內派系鬥爭籌碼，甚至因為黨團不合的緣故，重蹈戰前國民黨青年組織的覆轍，致使青年漸漸對國民黨失去信心（呂芳上1994；曹忻2008）。

從五四到北伐，再到抗戰期間，青年論述由最初的啓蒙主義與理想主義、青年身體與國家國體之間的連結與比喻，因為政黨的中介而有了清晰具體的政治傾向、組織形式與行動規劃。但青年從譬喻落為實體的動員過程，也使得原先其所蘊涵的政治意涵發生變化：從國家與國體現代化的雙重抽象意象，到被具體集結、擔負國家與改造機能的動力，再縮窄為政黨爭奪政權的動員與爭取對象。

三

1949年年底，國共內戰節節失利的國民黨敗逃至臺灣。但在4月「四六事件」爆發、五月宣布臺灣全島戒嚴以前，島內的學生運動仍如火如荼地開展。¹⁶1950年6月，南北韓局勢一觸即發，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臺灣海峽中立化」，派遣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此舉形同美方確認與強化中華民國的戰略位置與國際地位。蔣介石在臺灣地位獲得美方的有力支持後，遂在同年8月組成中央改造委員會，重新展開大陸時期未完的國民黨中央改造案。此次改造除了廓清黨內派系之爭、確立蔣介石在黨內的主導權外，同時也重建了國民黨的黨務系統，將臺灣原先低度發展的黨組織深入婦

16 本文並未處理的是，戰後至政府遷台前（1945-1949）臺灣社會關於「青年」的想像與論述，亦受到日殖時期中等與高等教育和青年組織所生產的青年概念的影響。而更重要的是，臺灣史中的青年論述與近代史中的青年論述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不過，本文更關切的是在戰後總動員體制之下，中華民國政權透過催動青年論述對青年群體所執行的強制性政策安排，因此相對於考察日殖的青年意涵，民國的青年意涵毋寧更加重要。日殖時期的青年論述建構可參考陳文松（2015）。

女、農民、漁民、知識份子與青年之中。記取在大陸慘遭共產黨學潮打擊的教訓，蔣介石高度重視青年教育與組訓的重要性，「無論黨部、政府、軍隊的根基，是全在於青年。」¹⁷蔣介石也曾直指失去大陸的原因在於「教育與文化」，尤其是「學校教育中，不注重生活教育和人格修養教育」。爲了反攻大陸，就必須反省國民黨在教育上的失敗。國民黨之所以在五卅後爭取學生的校園戰場上敗給了共產黨，蔣介石認爲是因爲五四精神的內容不爲人所深切研究，「於是民主與科學失其精神的依據，乃至爲共匪的唯物論乘機利用。」他因而強調必須要重新以三民主義詮釋五四精神：「民主」是遵從「紀律」與「法治」的民權主義，而「科學」則是「窮理致知」，足以替代民生主義，遺漏的是對應民族主義的理念——「救國」。爲了對抗共產黨壟斷詮釋權的民主與科學，針對青年的救國教育也就承擔著收復大陸的「第一等責任」。¹⁸

除了在校園中佈置知識青年黨部外，國民黨也設置了推動黨化教育與

17 相對於被賦予無盡希望的青年，在蔣介石來台後的談話中，「少年」只有三種型態：除了「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之外，在臺灣，有若干因社會虛華風氣而傾向不良的太保、嬉皮；在大陸，有因共產黨而失去自由的紅衛兵，見蔣介石。1968。〈對國民教育小學「生活與倫理」中學「公民與道德」課程之指示〉。《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七。Retrieved from: http://www.ccfid.org.tw/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35:0004-128 on Aug 7, 2019. 1968年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後，第三種兩岸對比的說法則有被強化的趨勢，同時也更強調少年升學時應考慮「國家建設需才孔急」的情況。見蔣介石。1971。〈對國民中學首屆畢業學生訓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九。Retrieved from: http://www.ccfid.org.tw/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027:0015-30 on Aug 7, 2019.

後兩種對少年的想像，都預設了一種純真、自由，而且無助的少年的原型，因爲諸多原因而被迫身陷困境，必須由國家和家庭嚴加管教。關於法律如何建構了當代臺灣少年主體的過程，可見劉晏齊（2015）、何春蕤（2017）。

18 見蔣介石。1951。〈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四。Retrieved from: http://www.ccfid.org.tw/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74:0023-18 and http://www.ccfid.org.tw/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42:0022-19 on Aug 7, 2019.

關於科學與民生主義之間的連結，據孫中山（1924）〈民生主義第一講〉所說，民生主義即是要解決當時國外已出現近百年的社會問題。立基在同意馬克思探究社會問題的「科學」方法，卻反對馬克思對於階級、唯物論與剩餘價值論的基礎上，民生主義必須先透過科學，「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

軍事訓練的青年組織即救國團，其出現代表國民黨對青年運動的高度重視與積極推動。1950年，台大、師大等大專學生倡議組織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是為救國團前身。1951年年底，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二組反覆研議後，依循「民族主義救國」的口號，提出中華民國反共抗俄救國團組織原則，並邀請教育部、內政部、國防部總政治部等從政黨員負責籌備。¹⁹在該組織原則中，規劃了救國團在反攻前、反攻時與光復後三階段的不同任務：在反攻以前，救國團團員負責「參加各種訓練，從事社會服務，協助文化宣傳，社會調查，推行政令，以及發動勞軍、從軍及總動員運動」；一旦正式反攻大陸，團員將隨即編入戰地政務系統中，「協助軍隊擔任運輸，救護，情報，通訊，組訓民衆，整理戶籍，肅清匪諜，建立社會秩序以及有關戰時工作。」²⁰由此而言，救國團混合了準戰時體制的青年組訓工作，以及戰時體制下的戰地政務工作（*ibid.*）。1952年青年節的〈告全國青年書〉中，蔣介石正式宣布將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讓廣大青年在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之中，獲得「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全面改造」。²¹同年5月，行政院頒布「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籌組原則」，為設立救國團的法源依據。10月，救國團正式成立，隸屬國防部總政治部，由蔣經國擔任第一屆主任，原青聯會成員則全數加入救國團。

在救國團的想像中，足以承擔救國重任的青年，必須是對戰爭妥當準備的、具有強健體魄的軍事身體，反攻戰爭是訓練與規劃青年身體使用方式的前提。1950年代，救國團主要負責軍訓教育、愛國教育與暑期營隊等三方面的工作。在軍訓教育方面，其兩大原則為「體育的國防化」與「課外活動的軍事化」，²²也就是將軍事教練的內容當作體育課程授課（例如國

19 〈作者不詳〉。1951/02/19。〈中央改造委員會第297次會議紀錄：報告各級黨部小組提建議案對研討黨政社會興革、中國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應積極準備研商籌備等事項及討論決議設計會提擬具中央改造會各處組會40年度工作總檢討報告案〉，〈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紀錄摘要〉，《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02-110701-00011-001。

20 轉引自郭楠暘（2018：98）。

21 蔣介石。1952。〈中華民國四十一年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三。Retrieved from: http://www.ccf.org.tw/c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51:0004-74 on Aug 7, 2019.

22 出自幼獅出版社編（1952），轉引自張以收（2010：64）。

軍基本教練、障礙賽跑、手榴彈投擲、枕木運動等等)。課餘與課外時間的日常生活中，同樣施以軍事化的紀律與管理；暑期營隊方面，則是讓青年與軍人一同在戰地生活，並提供軍隊在戰地政務或康樂活動的輔助，進一步強化校園內軍訓教育的效果 (ibid.)。然而，救國團的積極青年動員政策，卻在1957年左右慢慢開始退燒。論者多已指出1957年年底試圖淡化救國團「政治性」的團務改革，其背景是軍訓課程的實施效果不彰、《自由中國》對軍訓教育的猛烈批評 (張嫻媚2016)。團務改革的具體內容則包含在縣市支隊下設青年育樂中心，在大專支隊設立學生活動中心，這些中心負責在地方與校園內培訓青年的體育與技能、促進校內社團活動的建置與發展，對今日大專校園的學生活動如「新生宿營」、「XX之夜」均有影響。伴隨團務改革的發展，救國團營隊組訓的內容也開始有所調整。1955年後，救國團的暑假營隊中增加了較多技能性與學術性的營隊，其中的學術性營隊更在1958年轉型為全國性的研究型社團青年年會。青年身體與國體的連結，隨同救國團表面上的政治性與戰鬥性角色，在此之後便逐漸淡化。

不論救國團去動員化的原因究竟為何，²³此時的「青年」論述又再度變化。相應於美援模式的改變，中華民國政府也在反攻大陸或根留臺灣的選擇中，開始重新省思和調整經濟政策，推出「加速經濟改革」、「改善投資環境」的相關法案。在外資來台、鼓勵創業的發展氛圍中，國家對青年的期待和運用也跟著改變。

四

隨著內部與外部局勢的劇烈震動，1960年代不僅是臺灣威權政體進一步鞏固的年代，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模式的重大轉折點。在獎勵投資的政治風向中，國家一方面鼓勵青年創業，另一方面也將農村青年引導到城市的

23 有論者從內政角度觀察，認為係因五〇年代末期臺灣民心背離國民黨的統治、青年對於反攻動員心態漸趨消極 (郭楠暘2018: 105-110)。但這種說法或許有待商榷：到底是因為什麼樣的歷史事件，導致了如此的轉變？僅從蔣經國的說法猜測，更無相關史料佐證，我們無法確知臺灣社會轉變的動力與原因。

工業生產之中，加速勞動力與勞動市場的形成。在此時，原先帶有政治動員意涵的「青年」論述，在表面上指涉開創新事業的國家頂樑柱、也看似是通往「青年黑手變頭家」階級流動之路的明燈，但在實際上無法對應到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只能成為工廠青年的事實。

經濟政策的變動，並不只是經濟發展模式的抉擇，同時也在未來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型態、人口結構的轉變方向等重要議題做出了選擇。得到國家政策支持的出口導向產業，其主要生產條件包含廉價勞力的運用與美援物資的補助，這使得經濟政策同時必須考慮到人力發展的問題，也讓經濟措施同時涉及到了人口與人力配置的調整與轉型。²⁴讓中華民國開始注意到人力問題的關鍵轉折，則是美方於1960年代提出的兩份報告（余煥模1997），即司丹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的「教育與發展」報告和美方勞工部官員的「臺灣人力問題與規劃」報告。1962年，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黃季陸因為前一年赴美參與司丹福大學主辦的克伯萊教育會議（Cubberley Conference），結識數位人力規劃與發展問題的教育專家，因此注意到「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教育之策劃問題」（司丹福研究所1962: i-ii）。以此為契機，中華民國便以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為對口，

24 人力問題與人口問題是現代化過程中兩道相互糾纏的一組問題，兩者不應獨立割裂看待。人力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勞動力再生產」，其具體做法是各種職業養成與就業服務；而人口問題則必須以「勞動力不生產」解決，透過家庭計畫、人口控制等方式為之。處在內戰情境下的中華民國，存在一群以「民族延續」與「反共復國」為宗旨、反對控制人口的保守派，這使得人口問題的解決或不解決，都帶有高度的政治色彩。唯因篇幅問題，本文並未討論人口問題的面向。關於中華民國技術官僚處理人口問題的經驗，可參考鎮天錫、尹建中（1983）。

人力問題被編為國家發展的目標之一，並不光只是為滿足受援國發展的經濟與政治需要，也與援助國內政局勢的發展有關。六〇年代初期，時任美國總統的甘迺迪在「新邊疆」（New Frontier）的口號下推出了1962年人力發展與訓練法案（Manpower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Act of 1962, MDTA），這項法案延續了戰前小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國策，試圖以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等相關措施，降低經濟繁榮時期的嚴峻失業問題。此外，早在艾森豪執政期間，美國勞工部就已開始配合美國的援外政策，透過勞工部國際技術援助團（Department of Labor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Assistance Corps, DOLITAC）、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SECO）等單位，以「人力資本與運用」的概念為核心，向亞拉非等地輸出人力調查與統計、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失業救濟等就業服務的工作項目，這也是司丹福研究所與魏斯來台的背景。

由美國援華公署和亞洲協會出資，邀請司丹福研究所經濟發展處的數名研究者來台，訪問教育機構、公私營公司行號、政府機關和駐華使館，並對已受訓人力與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在該份報告中，面對教育與經濟人力的「甚少配合」，教育又因為某些因素而無法「配合經濟發展」，司丹福研究所據此在「教育與整個發展計劃之配合」、「改進擔任技能與技術職位之工作者之地位」、「改進教育素質與經濟關係」，以及「減輕短期人力不平衡」等四個方面提出意見供中華民國政府參考。具體來看，司丹福研究所的建議是要求教育部主導與經濟部、美援會、內政部、財政部、國防部的跨部會合作，一方面盡力宣傳與創造「技術工人」為一種承載現代技術與國家建設職責、可以作為人生與職涯目標來追求的工人類屬；另一方面則以入學審查、招生標準、學費政策、性向測驗、職業分析等就學與就業服務工具，穩定引導學生進入國家安排的教育體制，以便「協調預測之人力需要」（*ibid.*）。1963年，美國勞工部國際勞工事務副助理秘書魏斯（Harry Weiss）在援華公署署長白慎士（Howard L. Parsons）的邀請下來台，其所訪談的對象大致與司丹福研究所相同，但訪問的時間更短、訪談進行得更少。該份報告重新確認了司丹福報告的有效性與必要性，並強調中華民國政府應在編製經濟計畫的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CIECD）主導下，成立跨部會的工作小組，獨立編製人力計畫，並以此改善人力規劃、就業服務、教育計畫、職業訓練、人力運用等方面的行政作業。這兩份報告的研究建議，透過1964年經合會下增設的人力資源小組付諸實現。該小組透過與美國勞工部派來的專家何普樂（Chester Helper）等人合作，整合民間人士、企業家與學者的建議，跨部會合作提出通盤性的人力規劃，其最早的成果則是歸屬於第四期經濟建設四年計畫的第一期人力發展計畫。在這項計畫之下，教育、勞動、就業、人口、人力等不同行政部門的管轄範疇，透過經合會等各部門官員及學者專家的合作而融為一體。根據負責人力資源小組相關業務的官員的說法（鎮天錫、余煥模、張丕繼 1983），人力發展計畫的基本概念可以用「提高人力素質」、「維持高度就業」和「改善勞動標準」等三個與「經濟發展」正相關的目標的循環表達：透過政策完成這三項目標，可以打破「靜態」、「聽天由命」的農業

經濟，消除工業化過程的「疑懼和抗力」，進而促進經濟的加速發展；經濟的發展也將帶動人力素質、就業率與勞動標準的不斷提高（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資源小組1964）。

對於美方提出的「人力問題」，最明確的回應來自當時剛剛就任行政院院長的嚴家淦，在闡發人力概念的同時，他也重新定位了政府與青年於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1963年十二月，在新聞編輯人協會會員大會致詞時，嚴家淦趁機提出了對於美方人力報告的看法，該次演說的講稿後來被視為「人力政策的指導綱領」（鎮天錫、余煥模、張丕繼1983: 11）。在該文中，嚴家淦將人力定位為社會經濟發展、增加國民生產所需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但是，在臺灣由「農業社會逐漸演變為工業社會後」，原本被大家庭制度隱藏起來的失業人口或不充分就業人口，頓時成了阻礙經濟發展的絆腳石。為此，嚴家淦認為政府應該要「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業和發展的環境」，而不是「直接去創辦各業以容納所有失業人口」；人們——尤其是青年——必須要「發揮創業精神」、「從各行各業中去創立天下」；而且，在此過程中，拋棄舊有的職業貴賤觀念至為重要（萬賡年編1964: 1-4）。在嚴家淦的說法中，我們可以發現六〇年代「獎勵投資」與「人力問題」之間的區別和連結：雖然政府的角色只侷限於創造有利投資的制度、環境與風氣，但鼓勵的不再只是大型的、外來的外國資本或本外合營的資本，小型的、新興的中小企業與青年創業家也同樣是政府所鼓勵、輔導的對象。也雖然此時政府想要宣傳「職業無分貴賤」、資本家或工人並無好壞之別的觀念，但多數青年仍以自行創業為人生目標。1966年，由救國團指導、教育部兼辦的青年輔導委員會正式成立，其最早開辦的業務之一，就是1968年的青年創業貸款（王俊昌編2011），該項貸款的目的在於提供有志青年創設生產事業時所需的週轉資金，並予以持續性地追蹤輔導。不過，該項貸款在創設初期，曾因為抵押品價值超過申貸金額的兩倍以上，曾被部分青年創業家批評是「為富家子弟而設的」。²⁵青創貸款後來不斷放寬貸款資格、調降貸款利息、增加貸款額度，

25 桂生。1973/05/05。〈青年創業貸款，無異望梅止渴！現行規定辦法，幾人夠格借錢？〉，《經濟日報》第7版企業心聲。

顯示出該項貸款必須緊跟著當時快速改變的經濟環境調整，才能配合青年創業的需要。

從年齡性的「青年」論述所進行的青年輔導，卻也加深了青年間的階級性差異。相較於幸運獲得青創貸款支持、備受行政官僚肯定的創業青年，另一種毋寧更廣大、更眾多的工廠青年，卻往往被國家的視角所遺忘。事實上，根據在青輔會成立之初即於該會第一組服務的李德武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行政官僚對階級屬性欠缺體察的事實。李德武指出，當年青輔會之所以同時開辦創業與就業的業務，背後的想法是行政效率的考量：「輔導一個人創業，就可能創造很多個就業機會，這樣的方式算積極的輔導就業。」（王俊昌編2011: 236-237）對於青年選擇創業當老闆，或者就業做伙計，李德武則將兩者都視為某種「職業」，並透過就業輔導，讓青年理解到「當老闆不見得都好，當夥計也不見得都不好。」（ibid.: 245-246）也許是時間上的巧合，1966年也恰好是中華民國政府開辦「加工出口區」的年代，大量的女工在中學一畢業後就從鄉村離開，湧入新建的大型廠房裡，從事工資極低廉的簡單操作與初級加工工作。根據人類學者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的整理，自1965年至1977年間，領受薪資的女性人口從103萬人增加到了203萬人，其中「製造業、勞力、運輸業」增加的尤其迅速，在同一期間由13.6萬人增加到68.9萬人，增加了5.06倍（艾琳達1996: 266）。歷史學者黃富三則觀察到，在1970年代時，臺灣織造每一碼棉布的勞動成本僅需1.00美元，相較之下，其他東亞地區如日本（1.09美元）、香港（1.14美元）、印度（1.40美元）等地均無如此低廉的工資水準。²⁶勞工學者羅業勤更指出，女工相較於整體勞工或男工的工資偏低、工時偏高，再加上加班與夜間工作，造成的後果是普遍的營養不良與身體健康失常。²⁷

26 黃富三（1977: 67）認為這源於勞動工資的性別分化，以及加工廠大量聘僱工資較低的女工的緣故。羅業勤也從官方統計數據中觀察到，在紡織、成衣與服飾、通信器材、電燈泡、熱明管、精密機械與發電輸電配電機械等製造業中，女工的人數都明顯多於男工（朱明等1976: 70）。

27 羅業勤寫道，輪班制與夜間工作女工的狀況往往是：「次晨下了班，就迫不及待地上床休息，一覺睡到四點多，起來吃一頓晚餐，有時候，宿舍設備不好，日光滿堂，而機器聲隆隆不絕於耳，睡輒難穩，也造成食慾不振。能夠自己使用的時間常是晚上五時至八時，匆匆料理一下己事，晃眼又到十點上工時間，

上述勞工學者所批評的低薪高工時現象，不但延續到1980年代，更被當作一種國際出口的「競爭力」或「優勢」看待。直到1980年代初期，受迫於美國貿易法規與世界人權報告的壓力（湯蘭瑞1987；焦興鎧1989），制定設有基本工資條款的勞動基準法；出口導向的代工產業在1990年代開始移向中國東南沿海，要求技術與資本集中的電子產業崛起之後，昔日賺取大筆外匯的低薪優勢才成了發展劣勢，成為今日政壇競相談論的關鍵議題。

總而言之，「青年」範疇在1960年代開始有了劇烈的變化：原先為戰爭服務的軍事動員與身體意涵在此逐漸淡化，逐漸轉向、過渡到臣服在經濟發展的需要之下，青年成為後進發展過程中人力規劃的一環，青年運用腦力、形成與積累資本的能力更受重視。雖說化為經濟範疇的「青年」已不再是五四與民國傳統意義之下的政治動員，但既然戰後臺灣經濟發展也可以說是在內戰與冷戰的雙重因素之下，朝著「三民主義模範省」、「後進國家的發展典範」或是「太平洋上的自由燈塔」等政治目標前的結果；將青年群體劃入經濟範疇，當然也可以說是朝向同一種政治目標前進的政治動員。再者，我們也在1960年代的人力發展與青年輔導行政工作中，發現青年群體的階級性分化過程，又或者是看到戰後發展中國家對於青年主體的階級差異：有資本的青年可以被補助、去創業；沒資本的青年就到工廠裡頭去，賺取家用或第一桶金。最後，若再從更高的視野來看，不論是創業青年或是工廠青年，兩者都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被規劃的人力。從此之後，青年群體漸漸失去了政治屬性，成為經濟領域中特定的群體、類屬和特徵。

五

1970年代時，實際來台投資設廠的外國資本規模達到了歷史最高峰（薛琦1985）。不斷來台的外資對臺灣社會造成了全方面的衝擊，除了技術轉移、外部成本等經濟效果之外，其後果還包含工作模式與職業類別

常常沒有胃口再予進食，就入廠上上線了。結果變成一日一餐，營養不足而很多夜班女工都有胃病的毛病。」（朱明等1976: 89-90）

的新增和累積，這最終也影響到了青年就業的途徑。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間開始踏入職場的青年，比起風險性高的軍人或者薪資低廉的體力工人，最嚮往的莫非是到辦公室上班的「上班族」。²⁸值此勞動市場劇烈轉型、新興工作蓬勃誕生的時刻，企業管理專家與工商人士也開始注意到世代落差對勞動力管理形成的挑戰。與上班族相關的企業管理讀物，討論上班族的工作壓力、生活訣竅和消費新知的雜誌文章，在1980年代蔚為風潮。《中國時報》系統下的《工商時報》也在1980年代初期推出副刊上班族版，邀請社會學學者如蕭新煌、張曉春、張茂桂、徐正光等撰稿，討論上班族的勞動權益、工作心態與社會問題，並集結出版為上班族叢書。²⁹當時也有出版社大量選譯關於職涯選擇的日文出版品，如導演出版社的年輕上班族充電系列、世茂出版社的上班族工作手冊系列等。管理知識的譯介，表明臺灣的勞動市場管理階層還在摸索與學習該如何與進入職場的青年相互協調適應，其最重要的參照點則來自日本職場的經驗。

「上班族」逐漸成為日常用語的歷史時刻，也恰好是中華民國政權最風雨飄搖的年代。1979年，美麗島事件爆發，自雷震案以降維持近二十年

28 上班族一詞源於日本，是直譯為「薪水人」(salaryman, サラリーマン)的和製英語的中文翻譯。根據社會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的定義，上班族是指「商社或公家機關大規模科層組織中的白領員工」(傅高義2015:27-28)傅高義認為，上班族的大規模出現，代表著戰後日本新中產階級的現身，也是戰後日本社會之所以能維持安定秩序的緣由。目前文獻中最早出現「上班族」這個翻譯的，是在小說家陳映真1978年9月發表的小說〈上班族的一日〉中。(陳映真2001:195)

在小說中，黃靜雄是個被臺灣人主管「欺騙」而無法順利升職，賭氣宣稱要辭職，但卻無處可去只好回家待著的男人。離開公司的午後，他坐在家中，一邊思索著上班的(無)意義，一邊試著拾回大學時嚮往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拍攝社會寫實風格的紀錄片的理想，卻挫敗地發現重操(反資本主義的)夢想的不可可能。在黃靜雄試著找尋不上班的同伴時，他驚愕地發覺，整個世界「早已綿密地組織到一個他無從理解的巨大、強力的機械裡」，每個人趕忙通勤，「趕著到這個大機器中找到自己的一個小小的位置」，上班數小時後回家，只為了「把終於有一天也要長成像自己同其惶惶然的『上班族』餵飽——養大。」上班，是千篇一律的；待在家裡不用上班，是從來不應發生的事情，為了「一點點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而工作的上班族，「家無寧只是一個旅邸罷。」

29 從「上班族叢書」的出版緣起中推測(張曉春1987:3-4)，我們基本上可以確定陳映真的〈上班族的一日〉發揮了一定的效果，同時也影響了上班族版專欄的命名。

的社會安定與無政治反對狀態，終於被打破；中華民國也於同年與美國斷交，大量的外國資本偕同美國外交與軍事機構、國際組織一同撤離臺灣，其後，美國主要透過臺灣關係法、美國在台協會和亞洲基金會等管道，以及經濟貿易方面的往來，與臺灣保持非正式、非官方的關係；1987年，政府宣布臺灣本島解嚴，原先仍受壓制的黨外勢力與社會運動，擺脫了法律層次上的限制。在經濟上來看，約略與解嚴同時，臺灣的總體經濟數據表現十分亮眼：不但人均國內生產毛額超過了一萬美元，經濟成長率也始終保持在5%以上，並數度超過10%，臺灣的證券市場開戶人數也在1980年代隨著股票指數波動的劇烈程度快速成長。大量進入都市就業市場、受過較高程度教育的青年，發展出自主的經濟與消費能力，在當時快速變遷的都市消費市場，帶來不同於前一代人的購物習慣和生活風格，也進一步改造了廣告代理（郭良文2001；胡光夏2004）、內銷成衣（柯志明1993；溫肇東2016）、流行音樂（簡妙如2001）、化妝品行銷（藍佩嘉2010）等行銷或文化產業，使得這些產業在蓬勃成長之餘，變得更加商業化、大眾化，也更加地「文化工業化」。

不論是勞動市場或是消費市場，青年都已經改造了市場的消費與運作模式。市場也改造了青年主體，並對此時的青年提出了定義或論述，我們在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到今日的青年主體被進一步情感化的源頭。在消費市場中，源於日本廣告業界的「新新人類」因為開喜烏龍茶的數隻巧妙結合中國文化、現當代藝術符碼以及臺灣鄉土傳統的廣告，而成為流行詞彙。而在勞動市場的方面，首先是隨著都市化與工業化程度增加、高等教育的資源集中與擴張，離鄉就學與就業的經驗漸漸稀鬆平常，也因為1990年代經濟下行、就業難度增加，職涯規劃與就業輔導在此時成為具有一定規模的產業，如今知名的人力銀行如104（1996）和1111（1998）也都在此時紛紛出現，連帶地觸動了企業對徵才、招聘等人力資源管理知識的需求。再者，此時加入生產隊伍的青年，並不像1970年代農村女工進城工作時「畏懼對社會的情況一無所知」（楊青矗1978）、「初次離家的孤單無援／在心中冷冽拍擊」（李昌憲1981），而是習於城市生活、跟隨流行文化脈動，甚至帶點憤世忌俗的老鳥。在職場中，到職時間或者世代的先後次序

往往成了等級制度的職場文化的由來，其中最常見的說法，就是時至今日仍蔚為流行的「草莓族」。

最早發明「草莓族」這個稱呼的管理專家翁靜玉（1993），在其著作《辦公室物語》中將草莓族（也可以稱為「新新人類」）定義為1990年代「戰後出生（約45歲上下）的人口群所產下的子女（即戰後第二代）以20歲為主軸（18-25歲）的少年族群」，這一世代因為「出生背景環境比新人類更富裕，受到更多的保護」，他們在個性上「喜好華麗生活，不能吃苦耐勞，而且個性驕縱、難駕馭」，正如同溫室的草莓一般，故名之。翁靜玉認為，草莓族的特殊之處必須透過與「舊人類」（戰後出生，但在1990年代時年紀大過35歲以上的人口）比較而來，她共列出十點的差異（*ibid.*: xxii-xxvi），除了第一點淡淡觸及兩世代間經濟發展環境的落差外（「經濟環境優渥，與勞苦無緣，不知飢餓貧窮的滋味」），其餘各點都強調草莓族具有某種不同於舊人類的負面精神／情感特質（「忍受挫折的毅力低」、「內心閉塞害怕孤獨」、「非常感性」）。新舊人類的差異甚至是病理性的精神構造差別，例如相較於舊人類，草莓族的「精神年齡發展遲緩。」借用奧地利心理學者佛洛伊德的「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翁靜玉甚至聲稱草莓族「喜好及時享樂，追求刺激」，也因此是背棄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任憑本我（*id*）主宰的「個性極為衝動」的「現實症候群」患者與「功利主義者」。草莓族少數的優點，在於他們「對未來充滿抱負理想」、「樂於從事革新、富創意的工作」，然而，這些正面性格卻又只能在被資本主義宰制、與舊人類分工合作的職場中，透過成爲一個「有為、有守、有分寸，並能體認『樂在工作』的上班族」，才具有意義、也才能被看見與肯定（*ibid.*）。

對翁靜玉而言；抑或對於當年身為草莓族、如今卻已爬升到主管地位的「舊青年們」而言，他們很可能也認同以上多數的說法，可以套用在今天的青年身上。社會對草莓族的定義，因此可以說是代代傳承、向下拋棄的包袱。如果說翁靜玉成書時所謂的草莓族是「五年級生」，我們再以企管雜誌《Cheers工作誌》討論「七年級生」的文章與上述說法相比較，這

種層層向下「丟包」的過程就會顯得更加清晰。在最早討論七年級的2003年「七年級來了」專題中，該刊調查了身為主管階級的五年級與剛剛進入職場的七年級之間的認知差距，例如討論到兩個世代看待彼此在工作上的缺點時，五年級認為七年級「抗壓性低。接下來是眼高手低、穩定性差」，七年級則認為五年級「固執、不知變通」。³⁰此外，也有雇主和主管在受訪時提到面對七年級生的情感窘境，甚至又回到翁靜玉面對五年級生時的抱怨：這群人「耐壓性低、對企業忠誠度不夠」。³¹隨後，該刊提出為企業主管量身打造「搞定你的七年級團隊」的管理建議，其中特別強調七年級生「情緒問題多」、「溝通有障礙」等負面的情感特質。接著，該刊又繼續強調面對七年級生的管理，必須要給予熱情的「特殊待遇」，主管們必須「開始願意放下身段溝通」，因為這個「沒有經濟壓力」的世代不把「薪水或頭銜鍍金」擺在第一位，而是重視「歸屬感跟團隊情誼」。³²以上對七年級生的說法，其實都和翁靜玉對五年級生的看法相去不遠：生於富裕時代、重視情感交流（甚至往往公開地表達脆弱與憤怒），卻樂於發展創意與想像力。與其說這種對情感要求的期待重複是一種時代的巧合，不如看到橫互在這些期待的社會背景，或許來自形塑臺灣職場跨世代互動的、跨時而變遷甚少的情感結構，不論是職場的後到者必須服從於職場的先到者的社會等級次序，又或者是戰後臺灣發展中對於安定勞動力的需要與技巧，又或者是在社會追求經濟發展的氛圍中對於勞動力所寄寓的期待，這些不斷操演與強化的情感，以世代為媒介，不但形成了對於青年勞動力的規訓，也映照出作為一個偏安的、冷戰體制下生成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臺灣的特徵。

30 見藍麗娟。2003/07/01。〈五年級生VS.工作新世代〉。《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第34期。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8830> on Oct 20, 2019.

31 見盧智芳、沈偉如。2003/07/01。〈七年級來了！最矛盾的世代，首度進入職場〉。《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第34期。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1502> on Oct 20, 2019.

32 見盧智芳。2008/09/01。〈5大行動，讓七年級聽你的〉。《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第96期。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8834&page=1> on Aug 5, 2019.

六

本文完成的這個2010年代裡，以情緒為基礎的「世代」論述蔚為流行。然而，這只是戰後臺灣青年主體與論述從政治動員的工具轉變為領導經濟發展的動力，最終再被市場邏輯所吸收的結果。青年主體的寓意轉變，與臺灣社會從內戰與冷戰體制慢慢「冷卻」、轉進為後進發展國家的過程一致：在1960年代去軍事化，在1980年代去政治化，最後在2000年代進一步去經濟化乃至於貧窮化。不同於過去，當前臺灣青年面對的是世界體系產業鏈向著東南亞、南亞乃至於非洲等今日的後進發展國家調整與移轉，國家的發展與國際定位處於動盪時期。再者，臺灣究竟應該如何在這一波衰退後復興的調整期間，重新擺放在自己跨國資本主義的地位，已成了學術界與政府部門最重要的問題。其次，隨著經濟起飛的「奇蹟典範」衰退成奇蹟過後的「衰退典範」（李宗榮、林宗弘2017: 7-10），原先在奇蹟典範被斷斷續續地處理又擱置的勞工問題、環境問題等社會問題，繼解嚴後社會力爆發下誕生的公害問題論述以來，第二度成為社會輿論與媒體報導關注的核心。大量的職安事故與勞資矛盾成為新聞媒體報導的焦點，勞動法也成了立法過程中最受關注的法律之一。最後，臺灣還有作為偏安政權的、內戰所遺留且不斷迫近的國際地位問題，這個問題除了隨著兩黨輪替的政治過程而不斷重複地加溫、失溫外，其另一種表述方式——也就是認為中國對臺灣內部所施加的影響力已大到不可忽視——也使得統獨問題被解釋為當前臺灣內部社會矛盾叢結背後的核心矛盾。

在這個時代裡，「崩世代」與「厭世代」是近來定位青年問題兩個最清晰的座標。前者是親民進黨的勞工團體「臺灣勞工陣線協會」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所提出的政治口號，後者則是在文化界、生活用語中漸漸被廣泛使用，並因新聞網站關鍵評論網的專題報導而發揚光大的名詞。³³如同草莓族得以不斷生成，源於臺灣解嚴後經濟與社會發展所生產的情感結構，這

33 厭世代和崩世代的意義並沒有被以下的分析對象所完全壟斷和獨占，本文只是想回到每個概念誕生的原初場景，試著解釋這些概念被創造時所連結和勾動的情感反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

兩個詞彙在推廣的過程中，也依附著特定的情感修辭，並透過這些情感修辭試圖動員與改造社會力量。

在《崩世代》一書中，沿著「財團化危機」、「工作貧窮化」和「少子女化危機」等三條危機軸線，作者們試圖解析臺灣社會所面對的「全球新自由主義」威脅。這個威脅呈具為兩岸經貿頻繁往來帶來的衝擊、財團減稅與公債增加，以及工資停滯和工會衰退等三個現象（林宗弘等2011: 16-27）。³⁴要解決這些現象，就必須以北歐諸國為典範模型、廣泛介入各項社會政策領域的「創新福利國」政策，全面性改善社會保障、幼兒托育、女性參與、勞動條件、居住正義和資本跨國移動的問題（ibid.: 222-238）。「崩」在此指的是臺灣社會的「一整個世代的崩潰瓦解」，也是指「這個世代憤怒的爆發。」³⁵在前言中，該書科幻式地搭上「多啦A夢的時光機器來到2030年」，捏造了新聞標題，想像了臺灣將在2030年面臨的大崩壞——「百萬失業狂潮蔓延！」、「財團趁火打劫、民衆仇富再起？」、「臺灣人口跌破兩千萬！」、「平溪天燈再見！」、「反移民法大遊行今登場！」、「自殺漢：臺灣社會已崩壞」，並威脅性地警告，「二十年後，這是你想看到的未來嗎？」（林宗弘等2011: 1-6）在經歷過一連串的新自由主義批判與分析、提出理想中的社會創新政策後，該書在結尾再度幻想性地創作了另一種但同樣可能的新聞標題——「臺灣失業率破表但仍為亞洲最低」、「財團趁火打劫、政府Hold住？」、「貧富差距第二年下降！」、「少子化趨勢逆轉！」、「平溪天燈，幸福再現！」、「新臺灣之子：我愛臺灣，這裡是我家。」

為了證成這些未來的可能性、現象與民衆生活的關聯性以及其對於民衆的嚴重性，本書調動了大量社運人士與各個世代的代表以單句推薦詞或序言的方式支持。從社運人士的推薦詞開始，本書就在強調青年「看

34 不過，因為工會的失能起自臺灣資本朝向中國東南沿海和東南亞移動導致的資本外移與產業外移，工資的停滯則起自於兩岸經貿往來擴大和工會衰退，實際上的新自由主義化似乎可以歸結為政府傾資與中國因素兩個現象（林宗弘等2011: 24-27）。

35 臺灣勞工陣線協會。2011/11/09。〈關於《崩世代》〉。Retrieved from: <http://bombgeneration.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html> on Oct 22, 2019.

不到未來的希望」(施朝賢語)、「窮了、不生了、肩膀更重了,也茫然了!」(滕西華語)。該書請來的四年級、六年級與七年級的代表,也為臺灣社會的崩壞作證。四年級生的楊壹郎(2011)憂心的是,在國家傾向財團時,不但經濟發展的成果在數十年內就被掏空,「也吞蝕掉年輕世代原本應該擁有的希望。」他一連串的感嘆,特別關心自己子女的未來:「看著報紙寫的碩博士生找不到工作,也必須爭破頭擠進清潔隊捧公家飯碗,我就憂慮一對就學中的子女,出社會後工作會順利嗎?會不會領著低薪還要害怕失業?又或者被迫接受勞力輸出的命運?唉,像我們這般普通又無家世背景的父母,怎會不擔心子女的未來?」六年級生蘇凱蕊(2011)從父母、自己以及子女三代之間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下的生活說起,並坦承地說出對於自己子女所處的學歷失效、工作機會減少,以及與大陸資本和勞工競爭的惡劣成長環境的擔憂:「教育程度不再是生活的保證,因為社會上的工作機會可能已經少一半。『實力原則』的標準早該重新定義,更何況還有虎視眈眈、宛如螞蟻雄兵般又便宜到死的426?」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她沿著《崩世代》一書的思路,想像著大女兒長大後可能的未來:「她可以選擇安心帶著孩子或另一半,走在寧靜的社區公園,不用擔心隨時會失業、治安敗壞、族群衝突、政府破產,還有怎樣都清不完的滿地狗大便。我希望那是一個文明自律、和平共生的世界,一個人類歷史不斷重蹈戰火覆轍、尚未達到的境界。」七年級後段班的羅映儒(2011)則以抒發個人感懷式的抽象語氣,呼喚與自己年紀相仿的七年級生,讓大家「能夠併肩伸出胳膊,關心正在呼吸的臺灣社會,究竟是哪裡堵塞了?»;她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崩世代》,「試著讓自己多去思辯看看事實背後的真理,如同我們明白飲水思源的道理一樣[...]一同成為崩世代的拒馬,將財團化、貧窮化、少子女化矗立在我們的國家之外。」《崩世代》以政府與財團勾結和中國因素為引,從日常生活與社會現象看出社會崩壞的前兆,並提供了兩種想像的未來:是要一個中國入侵、社會崩壞的臺灣,還是要一個可以回去的、有著家的溫暖的臺灣。該書的世代代表無不動用情感性的修辭,有些可能是對未來感到絕望的,也有些是充滿盼望的,或只是溫柔地希望能夠有多一些人關注和思辯,其中也夾雜著

文明優越感和民族主義的雜音。這些修辭尋找著日常生活中的崩壞，跳過連結日常生活與社會崩壞持續放大的中間機制，並將這些崩壞蔓延成對於下一個世代的擔憂——擔憂子女的工作機會、擔憂未來出去工作的薪水，也是擔憂臺灣社會可能的治安敗壞、族群衝突與政府破產，但卻也是擔憂社區公園裡會不會「滿地狗大便」，臺灣會不會到處都是「便宜到死的426（即大陸人）」。崩壞起自細碎的生活感受，但好像又可以與整體大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趨勢呼應，在細碎感受所湊起的世代崩壞感中，年輕世代的未來成爲了值得被擔憂的目標。

另一種流行的世代情感，則是「厭世」：對於未來的迷茫，以及對於無力改變未來的現在感到無可奈何。在以「厭世代」爲標題的書中，關鍵評論網的記者吳承紘透過採訪厭世青年、中小企業主以及官方的說法，試圖呈現生活在這個時代裡的不容易、無出路以及挫敗感。該書透過細緻的深度訪談，討論了厭世代在情感標籤之外的生活處境，公車的票價、吃飯的開銷、學雜費的多寡，掙扎試著滿足（來自富裕世代的）父母的期待，也談了青年的勞動力有多麼廉價。吳承紘（2017: 14-15）在書中感嘆，這些人「啣著滑鼠出生且擁有臺灣有史以來最優秀的素質，日日在街上與我們擦身而過〔…〕但他們卻疲憊而『厭世』。」爲什麼厭世？原來，「原本應該是發光發熱的年輕一代，因爲低薪而失去夢想的力量，對未來充滿徬徨，隱隱的不滿無從抒發，只能在不友善的環境裡想辦法找到出口，擺脫這一切。」對吳承紘而言，當代青年最核心的生存難題在於低薪。因爲低薪，厭世代「連夢想都沒資格擁有」，在這個以買房、買車與結婚爲人生勝利組的社會中，青年承襲了這一切觀念的重壓，但卻又面對著觀念與現實的巨大落差，正是「厭世代們最深層的厭世來源」（*ibid.*: 78）。吳承紘在書中各處清楚地指出，問題不在當代厭世的青年身上，而是因爲臺灣的就業市場結構與初入職場的薪資無法跟上時代潮流，問題在於這個「隱藏在背後的『加害者』與體制」，任憑青年被潮流刮走（*ibid.*: 88-89）。在這份調查報告中，我們可以讀出吳承紘對於時代的無奈，以及他對於身邊青年朋友的厭世、避世、棄世的同理和更多無奈。然而，這些情感最終又該歸於何方？到底隱藏在青年低薪問題背後的加害者是誰？本書收束

在針對政府官員的訪談，訪談的內容顯示了吳承紘對於終結厭世的建議作法。在本書的結尾，吳承紘先是透過對中經院副院長王健全의 訪談，連結了臺灣經濟發展、中小企業與青年低薪的問題並提出分析。王健全在訪談中指出，臺灣青年的低薪困境源自於在不當的產業政策下無法順利擴張盈利的中小企業。因為內需與消費不足、中小企業衰退，再加上產業無法成功升級，「GDP沒有成長，所以你薪水當然上不來。」(ibid.: 134) 既然產業升級失敗才是低薪的主因，解方就不在保障勞工不受雇主剝削、也不在主動改善勞工的薪資條件，而在於如何讓雇主的利潤增加，或是促進市場機制能夠更健全地發展。延續這個問題意識，吳承紘接著對新創立委余宛如追問要如何讓產業順利轉型(對前者而言，這是解決低薪問題的根本之道)，余宛如則強調，產業轉型的第一要務在於鬆綁各項法規，只要法規可以鬆綁，就可以「有青年因此找到舞台成為創業模範」，重點是要為青年「創造舞台」，讓他們看到「未來的機會」(ibid.: 143-147)。雖然吳承紘指出了厭世的經濟基礎，也說明了經濟基礎崩毀時青年自然產生的厭世感，但對他來說，解決厭世感的方式卻是重複鬆綁法規、獎勵投資的老調：讓青年去創業吧，創業是創造希望、就是創造未來，政府只要給他們自由和獎勵就夠了。放在1960年代前景大好的經濟上行期間來看，創業或許是走在黑手變頭家的大道上最符合經濟理性的舉措。然而，在2000年以降反思新自由主義惡果的聲浪中，余宛如卻繼續提倡政府的最小化，並將其冠以希望與未來之名。這些作法是否有效，在過去60年來的實踐中，或許不能說是缺乏實證證明；然而，由國家主動地創造便於就業的市場環境，是否具有任何歷史時段都有效的普適性？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1990年代的亞洲金融風暴，乃至於2010年代初期的金融海嘯中，似乎展現了其確實存在著風險與不穩定性。這或許也顯示了「厭世代」情感內裡的邏輯矛盾。

崩世代或厭世代，其基礎都從細小的生活感受出發，特別是薪資的倒退。近幾年來，臺灣青年初入職場的薪資，不但沒有從上世紀末的金融風暴中痊癒，更沒有從2009年的金融海嘯中復原。薪資倒退數十年，已是每年反覆出現的「舊聞」。然而，這些生活感受的情緒要指向何方？薪資倒

退和社會的崩解又是誰負起責任？《崩世代》的作者認為必須要重新打造臺灣的國家體制，《厭世代》的作者則提議要產業升級、鼓勵新創。爲了達成他們各自倡議的議程，兩方都調動了強烈的情感：維持現狀就是「絕望」、「茫然」、「徬徨」、「厭世」、「無力」、「無可奈何」，但試圖改變現狀又需要什麼樣的情感？若按照各自的政治議程前進並達致理想的社會，這些情感就不會存在了嗎？更根本的質疑是：這些作者提出的社會發展提案，真的能夠改造並糾正臺灣的經濟體質，擺脫財團治國或青年低薪的窘境嗎？

七

世代論述原是清朝末年的發明，其中的「青年」曾帶有光輝、希望與改變的政治意涵。隨著先內戰、後冷戰的結構性制約，青年主體一路從改革運動、政黨動員，掉落成反共軍備的主體。當青年的身體與政治意涵被汲取殆盡，這股論述跟隨著臺灣在1960年代啓動的一系列政治與經濟改革，在後進發展過程與政治與經濟的變動關係中，被重新改編爲「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國家的主人翁」，從街頭和戰場走進了工廠與辦公室之中，屈服於發展主義與資本主義之下。在外國資本和全球產業鏈深刻地改造臺灣社會的經濟體制時，也因為緊迫變遷的外交關係與國際地位、黨外運動與解嚴，以及社會因富裕而不斷加速的都市化與工業化變遷，青年們被新自由主義市場給重複包裹，成爲資本從商品與勞動力兩方面雙重的剝削對象。2000年以降，青年卻又反倒成了「貧困世代」裡的「窮忙族」，追逐著高速發展結束後的幻影，活在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夾縫。

本文粗略地回顧了戰後臺灣青年論述從政治層次轉往經濟層次的歷史過程，並以相伴於這段情感歷史的臺灣經濟發展史作爲往復對比的對象。背後的依據與信念是：隱身在感受政治與情緒反應背後的情感結構，應該要被看成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結構的一部分。這也是說：經濟發展史之中的情感與感受性，將是我們認識經濟發展過程的另外一條重要進路。具體

言之，我們也應該探究的是：人們是如何在戰後的歷史時空中，認知乃至於體會中華民國政府國際居冠的經濟發展成就？政府部門如何對人民宣傳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人們又是如何接收和理解這些攸關經濟情勢的政治宣傳？經濟訊息是如何被感受、接收、理解、體會，人們的生涯抉擇又是如何被這些經濟資訊所影響？這些探究並不是試圖古典地強調「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畢竟經濟現實並不是決定情感知覺的唯一條件。考慮到過去的討論較少從長歷史時段追蹤特定論述的建構與發展，也較少後設地觀察「世代」概念。不加反思調度世代差異，宣稱某某世代如何又如何，這絕非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抱持的心態。作為開啓看穿世代論述的起點，本文只是一份備忘錄，試著從某些較為顯著的歷史時空中讀取線索，以此提示後來的研究者和青年行動者：這些事件中蘊含著「青年」在改造現實的能力上的局限與可能性，若能好好掌握，那麼這世界歸根結底是屬於你我的。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Linda Gail Arrigo (艾琳達)。1996。《激盪！臺灣反對運動總批判》*Jidang! Taiwan fandui yundong zong piban* [Muckraker! An Overall Critique of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in Taiwan]。台北 (Taipei)：前衛出版社 (Avanguard Book)。
- Vogel, Ezra F. (傅高義)，鄧伯宸 (Deng, Bo-Chen) 譯。2015。《日本新中產階級》*Riben xin zhongchang jieji* [Japan's New Middle Class]。台北 (Taipei)：立緒文化 (New Century Publishing)。
- 王俊昌 (Wang, Jun-Chang) 編。2011。《尚青的故事：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口述歷史1966-2010》*Shangqing de gushih: xingzhenyuan qingnian fudao weiyuanhui koushu lishi 1966-2010* [Story of the Youngest: Oral History on National Youth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1966-2010]。台北 (Taipei)：青年輔導委員會 (National Youth Commission)。
- 王鋒 (Wang, Feng)。2009。〈抗戰時期「知識青年奔赴延安」現象〉“Kangzhan shiqi ‘zhishiqingnian benfu yanan’ xianxiang” [“Zhishi Qingnian Going to Yanan” During War of Resistance]，〈二十一世紀〉*Ershiyi Shiji* [21st Century] 114: 51-58。

- 王燁、李永奇 (Wang, Ye and Li, Yong-Qi) 。2009。〈《新青年》上海時期的文化蘊涵及生產方式〉“Xin qingnian shanghai shiqi de wenhua yunhan ji shengchang fangshi” [Cultural Content and Mode of Production of *La Jeunesse* in Shanghai Period]，《江漢論壇》*Jiangnan Luntan [Jiangnan Forum]* 6: 85-88。
- 司丹福研究所 (Standford Research Institute)，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 (Industry Cooperation Committee) 譯。1962。《教育與發展：中華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教育計劃之任務》*Jiaoyu yu fazhan: zhonghua mingguo jingji fazhan guocheng zhong jiaoyu jihua zhi renwu [Education &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台北 (Taipei)：司丹福研究所 (Standford Research Institute)。
- 幼獅出版社 (Editors of Youth Publisher) 編。1952。《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Zhong guo Qingnian Fangong Jiuguotuan [China Youth Anti-Communist National Salvation Corps]*。台北 (Taipei)：幼獅出版社 (Youth Publisher)。
- 朱明、羅業勤、劉安安、黃漢龍、楊青蠡 (Zhu, Ming, Luo Ye-Qin, Liu An-An, Huang Han-Long and Yang Qing-Chu) 。1976。《她們的血汗、她們的眼淚》*Tamen de xiehan tamen de yanlei [Their Blood, Their Tears]*。台北 (Taipei)：拓荒者出版社 (Tuo Huang Zhe Publisher)。
-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資源小組 (Committee of Human Resource, CIECD, Executive Yuan) 。1964。《人力發展計畫簡介》*Renli fazhan jihua jianjie [Introduction to Manpower Development Program]*。台北 (Taipei)：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資源小組 (Committee of Human Resource)。
- 呂芳上 (Lu, Fang-Shang) 。1994。《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Cong xuesheng yundong dao yundong xuesheng [From Student Movement to Mobilized Student]*。台北 (Taipei)：中研院近史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吳承紘 (Wu, Kelvin) 。2017。《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Yan shidai: dixin, pinqiong yu kanbujian de weilai [The Generation of Tiredness: Low Wages, Poverty and Inability to See the Future]*。新北市 (New Taipei City)：月熊出版 (Moon Bear Publishing House)。
- 李宜涯 (Lee, Yi-Ya) 。2011。〈給「標準青年」看的小說——《青年進步》初期小說之分析〉“Gei ‘biaozhun qingnian’ kan de xiaoshuo: qingnian jingbu chuqi xiaoshuo zhi fenxi” [Novels for Model Youth: An Analysis of the Novel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Youth progress*]，《中國現代文學》*Zhongguo Xiandai Wenxu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0: 113-129。

- 李宗榮、林宗弘 (Li, Zong-Rong and Lin Zong-Hong)。2017。〈「臺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臺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Taiwan zhizao’ de jueqi yu shiluo: taiwan de jingji fazhan yu jingji shehuixue” [The Rise and Fall of Made in Taiwan (MIT): Taiwan’s Development and the Legacy of Economic Sociology], 收錄於《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臺灣經濟與社會》*Weijing de qiji: zhuanxing zhong de taiwan jingji yu shehui* [Unfinished miracl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李宗榮、林宗弘 (Li Zong-Rong and Lin Zong-Hong) 編, 頁7-10。台北 (Taipei):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李昌憲 (Li, Chang-Xian)。1981。〈嫁給輸送帶的阿霜〉“Jiagei shusongdai de a shuang” [A-Shuang Who Married to Convoyer Belt]。《加工區詩抄》*Jiagongqu Shichao* [Poems of Processing Area]。台北 (Taipei): 德華出版 (De Hua Publisher)。
- 何春蕤 (Ho, Chuen-Juei)。2017。〈臺灣法律中的兒少主體〉“Taiwan falyu zhong de ershao zhuti” [Child and Youth Subject in Taiwan Law]。《性別治理》*Xingbie Zhili* [Gender Governance in Taiwan], 頁63-80。桃園 (Taoyuan): 中央性/別研究室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ies, NCU)。
- 余煥模 (Yu, Huan-Mo)。1997。《三十年來臺灣人力發展政策實施之演進》*Sanshinian lai taiwan renli fazhan zhence zhi yanjin* [Progression of Manpower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 Taiwan Last 30 years]。台北 (Taipei):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委託計劃報告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CEPD, Executive Yuan)。
-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 (Lin, Thung-Hong, Hong, Jing-Shu, Li, Jian-Hong, Wang, Zhao-Qing and Zhang, Feng-Yi)。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Bengshidai: caituan hua, pinqiong hua yu shaozinv hua de weji* [Generation of Collapse: Crises of Capital Monopoly, Poverty, and the Lowest Fertility in Taiwan]。台北 (Taipei): 臺灣勞工陣線協會 (Taiwan Labor Front)。
- 胡光夏 (Hu, Guang-Xia)。2004。〈臺灣廣告代理業的生態形成與互動之研究 (1960-1980)〉“Taiwan guangguang daiye de shengtai xingcheng yu hudong zhi yanjiu (1960-1980)” [Form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Ecology of Advertising Agency Industry in Taiwan, 1960-1980], 《復興崗學報》*Fuxinggang Xuebao* [FuHsing Kang Academic Journal] 81: 177-206。
- 柯志明 (Ke, Zhi-Ming)。1993。《臺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以五分埔成衣製造業為案例的分析》*Taiwan dushi xiaoxing zhizaoye de chuanye jingyin yu shengchang zhuzhi: yi wufenpu chengyi zhizaoye wei anli de fenxi* [Market,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of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aiwan: The Garment Industries in Wufenpu]。台

北 (Taipei) :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孫中山 (Sun, Yat-Sen) 。1924 。〈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Sanminzhuyi: minshengzhuyi diyijiang”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 Lecture One] , 《國父全集1》 *Guofu Quanjì 1 [Sun Yat-Sen Complete Works volume 1]* 。 Retrieved from: <http://sunology.culture.tw/cgi-bin/g32/s1gsweb.cgi?o=dcorpus&s=id=%22TP0000000063%22.&searchmode=basicon> on Aug 7, 2019.

翁靜玉 (Weng, Jing-Yu) 。1993 。〈對新人類、草莓族的呼喚：自序〉“Dui xinrenlei caomeizu de huhuan: zixu” [The Call of X Generation and Strawberry Generation: Preface] , 收入氏著《辦公室物語》 *Bangongshi wuyu [Office Story]* , 頁xxii-xxvi 。台北 (Taipei) : 就業情報雜誌社 (Career Magazine Publisher) 。

張以牧 (Zhang, Yi-Mu) 。2010 。《強人威權體制下的青年組訓——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為中心的探討 (1952-1959) 》 *Qiangren weiquan tizhi xia de qingnian zhuxun: yi zhongguo qingnian fangong jingtuotuan wei zhongxin de tantao (1952-1959)* [Strongm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der the Youth Training: The China Youth Corps as the Center of the Study (1952-1959)] 。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Guoli zhenzhi daxue suoshi lunwen [NCCU Master’s Thesis]* , 未出版 (Unpublished) 。

陳文松 (Chen, Wen-Song) 。2015 。《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 *Zhimin tongzhi yu qingnian: taiwan zongdufu de qingnian jiaohua zhence [Colonial Domination and “Youth”: “Youth” Moralization Policy of Taiwan Soutokufu]* 。台北 (Taipei) : 台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曹忻 (Cao, Xin) 。2008 。〈誰有青年，誰有將來——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爭取青年的努力與挫折〉“Shuiyou qingnian, shuiyou jianglai: kangzhan qijian guoming zhenfu zhengqu qingnian de nuli yu cuozhe” [Who Owns the Youth, Who Owns the Future: The Efforts and Frustration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Striving for Youth Suppor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 《兩岸發展史研究》 *Liangan Fazhanshi Yanjiu [Journal of Cross-Strait Studies]* 6: 71-108 。

郭良文 (Guo, Liang-Wen) 。2001 。《臺灣的廣告發展》 *Taiwan de guanggao fazhan [Development of Advertisement in Taiwan]* 。台北 (Taipei) : 學富文化 (Pro-ed Publishing Company) 。

陳映真 (Chen, Ying-Zhen) 。2001 。《陳映真小說集3：上班族的一日》 *Chen Yingzhen xiaoshuoji 3: shangbanzu de yiri [Chen Ying Zhen Xiao Collected Novels Volume 3: One Day of a Salaryman]* 。台北 (Taipei) : 洪範出版 (Hong

Fan Publisher)。

梅家玲。2006。〈孩童、還是青年？——葉聖陶教育小說與二〇年代青春 / 啓蒙論述的折變〉“Haitong haishi qingnian? Ye Shentao jiaoyu xiaoshuo yu erling niandai qingcun/qimeng lunshu de zhebian” [Children or Youth? Ye Shengtao's Education Fiction and the Changes in Discourses about Youth and Enlightenment during the 1920's]，《臺灣文學研究集刊》*Taiwan Wenxue Yanjiu Jikan* [NTU Studies in Taiwan Literature] 2: 79-104。

——。2001。〈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啓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Faxian shaonian, xiangxiang zhongguo: Liang Qichao shaonian zhongguo shuo de xiandaixing, qimeng lunshu yu guozu xiangxiang” [Discovering Youth and Imagining China: Modernity,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Liang Qichao's "The Youth of China"]，《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Chinese Studies] 19(1): 249-276。

陳崇真 (Chen, Chung-Chen)。2019。《2008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2008 nianhou de qingnian pinqiong zaixian: jieru shenme? You zeyan shenme?* [Representation of Youth Poverty since 2008: What is Revealed and What is Veiled?]. 世新大學碩士論文 Shixin daxue s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Shih Hsin University], 未出版 (unpublished)。

梁啓超 (Liang Qi-Chao)。1900。〈少年中國說〉“Shaonian zhongguo shuo” [The Youth of China]，《清議報》*Qingyi Bao* [The China Discussions] 35。Retrieved from: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少年中國說> on Aug 5, 2019.

張淑媚 (Zhang, Shu-Mei)。2016。〈評析《自由中國》雜誌對戰後初期救國團教育 (1952~60) 之論述〉“Pingxi ziyouzhongguo zazhi dui zhanhou chuqi jiuguotuan jiaoyu (1952-60) zhi lunshu” [The Education of China Youth Corps: A Critic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ree China* (1952-60)]，《台灣國際研究季刊》*Taiwan Guoji Yanjiu Jikan*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2(3): 151-171。

郭楠暘 (Guo, Nan-Yang)。2018。《準戰時體制下的青年動員與社會想像 (1952-1958)》*Zhun zhanshi tizhi xia de qingnian dongyuan yu shehui xiangxiang (1952-1958)* [Youth Mobilizatio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Society under a Military-Ready System (1952-1958)]. 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Guoli zhenzhi daxue suoshi lunwen [NCCU Master's Thesis], 未出版 (Unpublished)。

陳獨秀 (Chen, Du-Xiu)。1915。〈敬告青年〉“Jinggao qingnian” [Advice to the Youth]，《新青年》*Xin Qingnian* [La Jeunesse] 1(1)。Retrieved from: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敬告青年> on Aug 5, 2019.

- 張曉春 (Zhang, Xiao-Chun) 。1987。《勞力勞心集》*Laoli laoxin ji* [*Articles on Physical and Mental Labor*]。台北 (Taipei) : 時報文化 (Reading Times) 。
- 黃富三 (Huang, Fu-San) 。1977。《女工與臺灣工業化》*Nyugong yu taiwan gongyehua* [*Woman Workers and Industiralization of Taiwan*]。台北 (Taipei) : 牧童出版社 (Mu Tong Publisher) 。
- 焦興鎧 (Jiao, Xing-Kai) 。1989。〈美國幾項重要貿易及投資法律中有關勞工權利條款之研究〉“Meiguo jixiang zhongyao maoyi ji touzi falyu zhong youguan laogong quanli tiaokuang zhi yanjiu” [*An Examination of Worker Rights Provisions in Several Important U.S. Foreign Trade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Legislation*] , 《美國研究》*Meiguo Yanjiu* [*American Studies*] 19(3): 51-116 。
- 楊青矗 (Yang, Qing-Chu) 。1978。〈龜爬壁與水崩山〉“Gui pa bi yu shui beng shan” [Turtle Climbing Wall and Water Falling Mountain], 收錄於《工廠女兒圈》(三版) *Gongchang nyuer quan sanban* [*Factory girls 3ed.*]。高雄 (Kaohsiung) : 敦理出版社 (Dun Li Publisher) 。
- 楊壹郎 (Yang, Yi-Lang) 。2011。〈「崩世代」別來〉“‘Beng shidai’ bielai” [*Generation of Collapse don’t come*], 收錄於《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Bengshidai: caituan hua, pinqiong hua yu shaozinv hua de we ji* [*Generation of Collapse: Crises of Capital Monopoly, Poverty, and the Lowest Fertility in Taiwan*], 林宗弘 (Lin, Thung-Hong) 等著, 頁xxi-xxiii。台北 (Taipei) : 臺灣勞工陣線協會 (Taiwan Labor Front) 。
- 溫肇東 (Wen, Zhao-Dong) 。2016。《紡古織今：臺灣紡織成衣業的發展》*Fangu zhijin: taiwan fangzhi chengyiye de fazhan* [*Weaving Past and Prentent: Development of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in Taiwan*]。台北 (Taipei) : 巨流圖書公司 (Chu Liu Publishing) 。
- 萬賡年 (Wan, Geng-Nian) 編。1964。《人力資源問題論叢》*Renli ziyuan wenti luncong* [*Reviews on Human Resource Problems*]。台北 (Taipei) : 國際經濟資料中心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formation Center) 。
- 劉人鵬 (Liu, Ren Peng) 。2000。〈「西方美人」慾望裡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Xifang meiren’ yuwang li de ‘zhongguo’ yu ‘erwangwan nyuzi’: wanqing yiqi wusi de guozu yu funyu” [*“China” and “200 million women” in “Western Beauty” Desire: Nation and Women from Late Qing Dyansty to May Fourth Movement*], 收入氏著《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Jindai Zhongguo Nyuquan Lunshu: Guozu Fanyi yu Xingbie Zhenzhi* [*Feminism Discourses in Modern China: Nation, Translation and Gender Politics*], 頁129-197。台北 (Taipei) : 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s) 。

- 劉晏齊 (Liu, Yan-Qi)。2015。〈爲什麼要保護未成年人？兒少福利、法律與歷史的分析〉“Weishenme yao baohu weichengnianren? Ershao fuli falyu yu lishi de fenxi” [Why Do We Protect Children? Children’s Welfare and an Analysis of History and the Law in Postwar Taiwan], 《政大法學評論》 *Zhenda Faxue Pinglun* [Chengchi Law Review] 147: 83-157。
- 湯蘭瑞 (Tang, Lan-Rui)。1987。〈美國貿易保護對於我國勞工權益批評之檢討〉“Meiguo maoyi baohu duiyu woguo laogong quanyi piping zhi jiantao” [Criticism from U.S. Trade Protectionism on Labor Rights in Taiwan], 《勞工之友》 *Laogong Zhi You* [Journal of Labours’ Friends] 411: 5-8。
- 薛琦 (Xue, Qi)。1985。〈臺灣蛻變中的外資〉“Taiwan tuibian zhong de waizi” [Foreign Capital in Changing Taiwan], 收錄於《第五次社會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Diwuci shehui kexue yantaohui lunwenji* [Proceedings of Fifth Symposium of Social Science], 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Institute of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cademia Sinica) 編, 頁183-197。台北 (Taipei) : 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Institute of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cademia Sinica)。
- 鎮天錫、尹建中 (Zhen, Tian-Xi and Yin, Jian-Zhong)。1983。《人口政策的形成與檢討》 *Renkou zhence de xingcheng yu jiantao* [Form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Population Policies]。台北 (Taipei) : 聯經出版公司 (Linking Books)。
- 鎮天錫、余煥模、張丕繼 (Zhen, Tian-Xi, Yu Huan-Mo and Zhang Pi-Ji)。1983。《人力政策的形成與實施》 *Renli zhence de xingcheng yu shishi*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Manpower Policies]。台北 (Taipei) : 聯經出版 (Linking Books)。
- 簡妙如。2001。《流行文化，美學，現代性：以八、九〇年代台灣流行音樂的歷史重構爲例》 *Liuxing wenhua meixue xiandaixing: yi bajiuling niandai taiwan liuxing yingyue de lishi chonggou weili* [Popular Culture, Aesthetics and Modernity: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80s and 90s Taiwan Popular Music]。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 *Guoli zhenzhi daxue boshi lunwen* [Ph.D. Dissertation, NCCU], 未出版 (Unpublished)。
- 藍佩嘉 (Lan, Pei-Jia)。2010。〈銷售女體，女體勞動：百貨專櫃化妝品女銷售員的身體勞動〉“Xiaoshou nyuti nyuti laodong: baihuo zhuangui huazhuangpin nyu xiaoshouyuan de shenti laodong” [Selling Bodies, Laboring Bodies], 收錄於《工人開基祖：台社勞工研究讀本》 *Gongren kajizhu: taishe laogong yanjiu duben* [The Advent of a Working Class], 陳信行 (Chen, Xin-Xing) 編, 頁355-385。台北 (Taipei) :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雜誌社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 羅映儒 (Luo, Ying-Ru)。2011。〈七年級後的崩世代〉“Qinianji hou de beng shidai” [Generation of Collapse after seventh grade], 收錄於《崩世代：財

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Bengshidai: caituan hua, pinqiong hua yu shaozinv hua de we ji* [Generation of Collapse: Crises of Capital Monopoly, Poverty, and the Lowest Fertility in Taiwan], 林宗弘 (Lin, Thung-Hong) 等著, 頁 xi-xiii。台北 (Taipei) : 臺灣勞工陣線協會 (Taiwan Labor Front)。

蘇凱慈 (Su, Kai-Rui) 。2011。〈讓「人爲的美麗世界」到來吧!〉“Rang ‘renwei de meili shijie’ daolaiba!” [Let the “man-made beautiful world” come!], 收錄於《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Bengshidai: caituan hua, pinqiong hua yu shaozinv hua de we ji* [Generation of Collapse: Crises of Capital Monopoly, Poverty, and the Lowest Fertility in Taiwan], 林宗弘 (Lin, Thung-Hong) 等著, 頁 xv-xix。台北 (Taipei) : 臺灣勞工陣線協會 (Taiwan Labor Front)。

二、外文書目

Chang, C. 2017.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Determinants of Earnings in Taiwan in the 2008 Recession,”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46(1): 55-82.

Williams, R. 2015.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